



永不
言敗

加利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永不言败 ——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著

Unvanquished
A U.S. - U.N. SAGA

Boutros Boutros-Ghali

张敏谦、钟天祥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 (埃及) 加利 (Ghali, B.B.) 著；张敏谦等译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12

ISBN 7-5012-1402-6

I . 永… II . ①加… ②张… III . 加利, B.B.—回忆录 IV . K834.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508 号

图字：01-2000-3083

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Yong Bu Yan Bai——Jia Li Huiyilu

责任编辑	郑志国 吴超莹
封面设计	郭宝珍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李 琴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28
邮政编码	100010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字 数	332000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0.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联合国工作的先生和女士、平民和士兵，他们为了全人类和平、发展和民主的事业，贡献了他们的精力、才能、知识甚至——在很多场合——他们的生命。

序言

这本书是关于联合国的最重要、最实用和最有趣味的著作之一。我这样讲是有充足理由的，在此仅列举其中五点：

第一，本书作者是一位从事国际法及国际组织问题教授达40年之久的学者。他第一部关于国际组织的著作发表于1954年，那是一本分析透彻、观点深刻的教科书。

第二，作者先后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副总理达18年之久，目睹了许多历史变迁，并亲身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在萨达特总统和穆巴拉克总统时期，他由于接近决策者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纳赛尔总统时期，他也是政府顾问之一。加利博士身处中东这一动荡地区，在埃及数届政府中任职，而这些政府的政策方向又各不相同。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授，也是一位出色的部长。

第三，加利博士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是一个哥普特人（埃及原住民的后裔——译者注）。他的妻子是一个犹太人，家境也很富有。尽管如此，他仍投身于艰巨的事业。在纳赛尔时期，他在著作中宣传社会主义；在萨达特时期，他陪同萨达特总统于

1977年11月完成了冒险的耶路撒冷之旅；在穆巴拉克时期，他是总统外交事务的重要顾问及非洲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在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国际论坛上为维护埃及的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加利博士以其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性著称。他与其他几位教授共同创立了经济与政治学科，他还创办了《国际政治》季刊和《阿克萨迪》经济周刊。

第五，加利博士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五年期间，积累了有关联合国系统的直接经验。在他当选时，关于他，关于他与美国的关系曾有过种种猜测。他目睹了世界政治格局由复极变为单极，他经历了联合国的沉浮。联合国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维和行动无论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对加利博士本人，都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他的“和平议程”、“发展议程”及“二十一世纪环境议程”等报告，虽招致很多国家的不满，但它们都是联合国的重要报告。这些报告有时被频繁引用，也有时遭到冷落甚至批评。

《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是对联合国文献的巨大贡献，作者本人曾深深卷入联合国事务。尽管加利博士熟谙外交和国际政治，但他在秘书长任内却领略了“强权即真理”及“权力支配一切”的深刻教训。他曾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讲授这些问题，但他在做部长时却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更是忽略了这些问题，最终自己成了牺牲品。

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加利博士是倔强的，这也导致了他的下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错误的。情形有时恰恰相反，但政治终究是政治，与理想有着天壤之别，理想有时支配了他的行动。

我在开罗大学学习期间有幸结识了加利博士；在他任部长期间曾与其共事；他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我是埃及常驻联合国副代

表。1991年，我曾在埃及外交界努力帮助他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并且作为埃及代表目睹了他任秘书长的所作所为。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与许多阿拉伯、穆斯林及第三世界国家对立；几周后，英国开始对他不满；在任职中间，他又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尽管他无论作为一位教授还是一位部长都是一个和解型的人，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似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无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我崇拜的老师，我以自己是他的学生而自豪。我相信，联合国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秘书长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在一个需要保持低姿态而不是锋芒毕露的职位上，好人总是待不长久。读他的书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联合国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大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而小国总是充满了失败感，尽管它们中的一些人以坐在插有自己国家国旗的座位上举手发言或投票而沾沾自喜。深入分析海湾战争、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危机，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很多小国的人民向联合国求助，呼吁联合国蓝盔部队帮助他们解决危机时，联合国内部利益和观点互相冲突的集团之间是如何达成妥协的。

中国支持加利博士竞选担任和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是明确的，并赞成加利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加利博士不仅在中国领导层，而且在普通民众中都很受欢迎。我目睹了他离任后于1999年9月访问中国的情景。每一个在街上、公园里或飞机上见到他的中国人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一起拍照或请他签名留念。或许中国人喜欢他是赞赏他反对超级大国的立场；或许是出于对埃及古老文明的崇敬——加利是埃及的伟大儿子；抑或是出于中国人民的善良天性——中国自己也属于我称之为“古老文明俱乐部”的国家，曾有过屈辱的历史，现正在摆脱过去的苦难，走上迅速发展之路。我深信，加利博士将以他的优秀人格、他的远见卓识

和鲜明立场而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人们也会感激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而我，作为埃及驻中国大使，一名老外交官和加利博士的学生，以能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而感到自豪。

埃及驻中国大使

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

2000年8月28日于北京

致 谢

在我完成此书的过程中，承蒙胡佛研究所主任约翰·雷西恩博士、副校长查尔斯·帕尔姆以及档案管理员埃琳娜·丹尼尔森提供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编辑罗曼·庞利恩纳对于此书的完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许多同事和朋友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帮助，我将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要求我这样做，但我对他们仍深表谢意。

作者说明

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同时出于一个作者的良知，我在这里只写了我当联合国秘书长的部分经历。我没有提及联合国在萨尔瓦多或其他地方取得的无可争辩的巨大成功，如联合国在帮助莫桑比克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并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变为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另外还有很多问题，尽管联合国多年来做了巨大努力，但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如塞浦路斯和西撒哈拉问题。我在这本书里着重讨论的是那些联合国参与解决的最有争议、最困难和影响最大的事件。

在美国对我竞选连任联合国秘书长投了否决票后，人们广泛猜测，我可能从一开始就与美国人立场相左，并在我的任期中隔阂不断加深，致使我成为惟一没有干满两届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本书会告诉你我的困难经历。我在这本书里所有针对美国的批评言辞都是由于失望，而我对美国的崇拜从来没有丝毫减弱。我希望，美国作为 1945 年联合国的缔造者，最终会允许该组织完成其最初的承诺。

目 录

序言	3
致谢	7
作者说明	8
第一章 美国的支持：得而复失（1991～1992）	1
第二章 面对新的冲突（1992）	31
第三章 遇到麻烦（1993）	70
第四章 政策带来后果（1994）	114
第五章 非洲与世界（1992～1995）	163
第六章 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1992～1993）	189
第七章 没有结局的结果（1994～1996）	222
第八章 挑战，挫折及民主化（1996）	272
后记	358
索引	361
译者名单	412

第一章

美国的支持：得而复失 (1991～1992)

随着我任联合国秘书长五年任期临近结束，我的一些朋友、³同事以及联合国的会员国要求我谋求连任。他们认为我使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务的独立性得到了加强，而且干得不错。以前的历任联合国秘书长都连任两届；如果我不谋求连任，那将是我对自己的祖国——埃及和非洲的轻蔑。我同意这一观点。而且说实在的，我的自尊心和成就感也驱动着我谋求连任。然而，谋求连任是有风险的：1996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联合国秘书长与美国总统的选举只是每隔20年才在同一年举行。我深知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可能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左右。事实确实是这样。

1996年1月，我应邀在牛津大学演讲。我的两位前任达格·哈马舍尔德和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分别于1961年和1986年在该校演讲。两位前任均在演讲中谈及了秘书长的作用。虽然当时的国际情况与我的两位前任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有显著差别，但我还是谈及了秘书长的作用。我的演讲强调了联合国秘

书长独立于国家之外行事的重要性，就像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并且还强调了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途径为联合国的行动筹措资金，因为美国拒绝支付联合国会费。

- 4 我的演讲激怒了白宫和美国国会。我的助手们以及美国两党的发言人都注意到我在过去的五年里太独立了。美国参议院指责我建议对国际机票少量征税用来资助联合国的开支是蔑视美国宪法，企图把税收强加给美国公民。虽然我仅仅是在重复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五年前首次提出并得到我支持的一个想法，但是华盛顿的联合国新闻办公室在描述华盛顿对我在牛津大学演讲的反应时使用了“火的风暴”一词。美国国会两党的四十多位众议员联署了一封信批评我。

1996年2月中旬，我在纽约市萨顿广场的联合国秘书长官邸举行的招待会上请求与我的两位朋友——美国前国务卿赛拉斯·万斯和卡内基公司的总裁戴维·汉伯格说几句话。我需要他们的建议。我究竟是应向公众宣布我将竞选连任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回避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悬而未决”？

赛拉斯的回答是，应该尽可能让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选举这两件事在公众的心中成为两个独立的事件。当时，我经常受到共和党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鲍勃·多尔的嘲弄和攻击。他把我的名字嘲弄地念成 Boo-trus Boo-trus（加利秘书长名字的拼写是 Boutros，译者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嘲笑的人群，而且他声称美国军队是在我的“指挥”下服务。毫无疑问，这些将会引起他的听众的注意。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则对美国人说，联合国是一个使他们丧失主权的全球性阴谋集团，而且还说那架属于联合国的“黑色直升机”一直在落基山脉地区几个州的上空飞行是为联合国接管美国做准备。为此，赛拉斯说，可能我应在当时，即1996年初，在美国各政党仲夏召开的全国大会之前宣布参加竞选连任。我当时并不太肯定是否应宣布参加竞选连任。我担心一

旦宣布这一消息反而会激起美国的反对。我请求赛拉斯和戴维替我悄悄地进行调查。

不久,《外事》杂志季刊刊登了我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内容。我在该演讲中强调,对联合国的可信性来说,一位独立的秘书长是至关重要的。编者按把我这篇文章的发表理解成是对美国的故意挑衅。我的文章被说成是一份象征我意欲竞选连任的蒙着薄薄面纱的宣言。

不 受 支 持

4月14日,星期天早上8点,万斯和汉伯格来看我。赛拉斯 5显得非常窘迫,不知如何开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给我读了来自克里斯托弗国务卿的消息:“政府已经决定不支持你连任。”

我告诉赛拉斯和戴维说,我对这张便条感到吃惊,但是即使美国投否决票我也不改变自己的主意。我说:“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法国和中国都强烈表示支持我。”我请求万斯和汉伯格对克里斯托弗措辞尴尬的便条以及我自信的反应保守秘密,因为这事一旦传出去,我将无法继续在联合国正常工作,何况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请赛拉斯和戴维转告克里斯托弗,我打算在美国总统的竞选期间对自己的未来悄悄地保持“悬而未决”的态度。虽然11月5日之后我将自己宣布角逐第二个五年的任期,但是我想向美国政府保证,在我的工作——主要是联合国秘书处的改革——打下牢固基础之后,我将在第二届任期届满之前辞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

八天之后,克里斯托弗从耶路撒冷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竞选连任的事让他认为这么重要,使得他打断在中东的日程安排给我来电话,让我感到吃惊。他说话时拐弯抹角,明显担心自己的

电话可能会受到监听。不过，我明白他是想向我证实克林顿政府已经决定“不支持”我。为了让任何碰巧听到电话的人都明白，我说：“尽管美国反对，但是我将仍然参加竞选连任。”1996年5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再见布特罗斯”的文章，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让我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毫无疑问，这是官方披露的消息。美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新观察》的编辑让·丹尼尔告诉我说，美国已经邀请西班牙的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不，”冈萨雷斯回答说，“现在已经有一位好秘书长了。”

6 5月13日，星期一一大早，沃伦·克里斯托弗求见。我们的会见是在秘书长纽约市官邸的大厅进行的。大厅的两头各有一个壁炉，其中一个壁炉上雕着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像，而我们就座的大厅另一头的壁炉上则雕着托马斯·潘恩和阿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头像。跟往常一样，克里斯托弗的衣着剪裁得无可挑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使我想起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50周年集会上，我夫人赖娅曾经问他的西装是哪里制做的。克里斯托弗提到了萨维罗的一个名叫切斯特·巴里的裁缝。我的管家端来了中东风味的糕点和咖啡。客人胃口很好，但是谈话中显得窘迫，并采取了守势。他说到我官邸来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他在耶路撒冷电话中所说的消息，即克林顿政府已经决定我不应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为什么？”我问道。

克里斯托弗说“鉴于我跟他的友谊”，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我说：“说吧，克里斯，作为一个朋友你欠我一个回答。”接着，我说：“为了知道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得美国政府这样做，这个回答对我很重要。”我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就是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我说，“这意味着美国不喜欢多边贸易这一概念。”美国与联合国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和争论。“这很正常。”我

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使得美国作出这个反常的决定？”

克里斯托弗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不能告诉我原因。我说：“你是一个杰出的律师，为什么不在克林顿总统那里替我辩护呢？”克里斯托弗微微一笑。“我是总统的律师，”他说，“不是你的律师。”我提到，尽管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反对，但我还是任命了很多美国人在华盛顿为联合国工作。我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需要美国继续支持我的工作。克里斯托弗没有回答。

他要离开的时候，我请他到我的藏书室去。从藏书室可以鸟瞰到一片草坪以及大型游艇和拖船来往穿梭的伊斯特河。我送给他一本《法约姆的肖像：古代埃及的面孔》。古代埃及法老时代末期，棺盖上画着石棺内被制成木乃伊的人生前的肖像。在开罗附近的一片沙漠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法约姆肖像”。我对克里斯托弗说，我曾经想拥有这些漂亮工艺品中的一个，但是由于费用太高，我只能通过我此时希望送给国务卿的这样的一本书来欣赏它。克里斯托弗看上去很高兴，而且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后来，我们再次谈到那个严肃的话题。他坚决要求我对我们的谈话保密，并要求我不要将竞选连任的意愿披露出去。我欣然表示同意，因为公开此事将会对我的工作造成损害。由于媒体将会知道我跟克里斯托弗的会面，分手时，我们一致同意对传媒说我们讨论了联合国的财政危机。7

虽然克里斯托弗拒绝告诉我美国决定我任期届满后必须下台的原因，但是我知道答案可以从199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动态以及在过去五年里所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事件中找到。

国际选举的政治

我在联合国的经历大约是五年前开始的。一次简短的谈话改变了我的生活。1991年5月，在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从

开罗飞往巴黎的途中，穆巴拉克总统说他打算提升我为负责外事的副总理。“此外，布特罗斯，由于你喜欢工作，我还让你担任需要加强控制的移民部的部长。”移民部负责管理 300 多万移居阿拉伯世界、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埃及侨民事务。

作为穆巴拉克的新副总理，我接受特殊的外交使命。1991 年 6 月，在代表他到尼日利亚的阿布贾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在一次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了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话题，因为那一届是轮到从非洲国家中选举一个人担任该职务。会上提出了喀麦隆、加纳、尼日利亚、塞拉里昂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候选人。

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说：“名单上没有一个人是说法语的。”有一个人接着说，“这些候选人都来自西部非洲。”于是，邦戈总统对我说：“布特罗斯，你为什么不毛遂自荐呢？你懂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你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联合国秘书长。”我认识这些领导人已经超过 15 年了。我为非洲的合作创立了一个由我领导的每年预算达数百万埃镑的特别基金。该基金使得我每年能够选送数百名埃及专家到其他非洲国家工作，并从其他非洲国家接受数百人到埃及进行培训。尽管基金并不大，但是知名度很高，而且说明了非洲国家领导人突然决定考虑让我来担任联合国最高职务的原因。

8 我用阿拉伯语写了第一本关于联合国的书。1954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曾经有过到联合国工作的想法。有一段时间，我曾希望成为总部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人。近年来，我则在考虑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冷战时期，联合国被超级大国撇到了一边，我并没有想当联合国秘书长的欲望。不过，现在联合国可以真正起到作用，并且存在将我多年来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